

中国经济转型与 发展的问题研究

◎ 陈迪平 著

ZhongGuo JingJi ZhuanXing Yu FaZhan De
WenTi YanJiu

ZhongGuo JingJi ZhuanXing Yu FaZhan De WenTi YanJiu

Ji ZhuanXing Yu FaZhan De WenTi YanJiu

ZhongGuo JingJi ZhuanXing Yu FaZhan De

WenTi YanJiu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经济转型与 发展的问题研究

◎ 陈迪平 著

ZhongGuo JingJi ZhuanXing Yu FaZhan De
WenTi YanJiu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问题研究/陈迪平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41 - 5811 - 3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②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0688 号

责任编辑: 范莹 侯加恒

责任校对: 陈文彬

责任印制: 李心鹏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问题研究

陈迪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7.75 印张 310000 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811 - 3 定价: 4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 言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它通过各种发展理论与战略、经济体制和可行性对策比较的方法,研究不发达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世界各国的地位可根据发展程度大致排列为:(1)高科技发达国家。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第三产业在 GDP 中占很大比例,工农业产值在 GDP 份额大大下降,农业产值只占有极小的比例。(2)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造品份额占商品生产总值的 60% 以上,并具有成熟的工业结构,正在向高科技领域发展。(3)半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造品占商品生产总值 50% 左右,工业区大多集中在局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够成熟,技术水平也不够高,但正在为迈向高科技领域准备条件。(4)初步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造品占商品总产值约 20% ~ 40%, 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基础设施不足,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5)非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造品在商品生产总产值中低于 20%, 大多是加工工业。同时,这些标准还要求伴有城市化率和人均 GDP 指标,如城市化率,一般初步工业化阶段为 37% 以上,半工业化阶段达到 50% 以上,工业化国家则要求达到 70% 以上。而人均 GDP 指标,初步工业化阶段达到 1000 美元以上,半工业化阶段达到 3000 ~ 5000 美元,工业化阶段则应达到 8000 ~ 10000 美元以上。发展中国家一般指非工业化国家、初步工业化国家、半工业化国家三个阶段。根据以上特征,并根据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均衡,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人均 GDP 水平并不高的基本情况,可以判断,从改革开放起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我国仅处在初步工业化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我国进入半工业化阶段;目前,我国正处在半工业化到现代工业化的演进阶段。所以,我国现在仍然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当一个国家由半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演进时,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的转型问题。“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经济转型是指一

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从体制转型来看，是经济体制的完全更新。如1978年前，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按当时的汇价计算，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30美元，而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91.33元，折合成美元还不足62美元。之所以这样，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多地暴露出我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因此，我们需要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结构转型来看，我国要从农业的、农村的、封闭的、传统的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的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它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经济转型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国民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在转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自己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一部世界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体制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史，即经济转型史。由于中国过去执行的是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相悖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落后，农业人口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经济转型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模式，加上经济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困难多，问题复杂。而正是这样，倒引发了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极大兴趣，不仅因为探讨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意义重大；还因为面对一些全新的问题更容易出新；更因为其中很多热点、难点问题都涉及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未来趋势，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经济学逐步成为“显学”。

我本人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到县委党校担任理论课教员，当时的学员基本都是基层单位骨干，和他们聊天，了解了很多农村、农民和基层单位的工作情况。后来我被抽调到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期间也了解了不少农村工作情况。80年代中，我得到去北京读研究生的机会，期间写出了几篇理论和调研文章，发表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新视野》《理论与改革》《社会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其中有一篇涉及乡镇干部招聘制度改革的被收集到中央内刊《中国国情报告》中，受很大的鼓励。90年代初调到湖南商业专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主讲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基础。1994年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和当时湖南商业干部管理学院合并，成立了湖南商学院，我从原

来的理论课部分到湖南商学院经济学系，讲授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课程。这时写的经济学文章，有一些发表，但研究方向并不十分明确。期间还写了一本投资类的专著，交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院校开始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我第一时间就担任了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我把研究方向定位于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上，以此来申报自己的研究课题。于是，我从1999年开始，陆续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省社科联课题和省教育厅课题。调到绍兴文理学院以后，又陆续取得绍兴市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课题2项，绍兴市统计局重大招标课题1项。这些课题基本上围绕中国经济转型主题展开，研究力求从全新角度切入。在研究中采用了比较法以及定性与定量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的方法，尽可能使结论有科学性、对策有可行性，因此研究的成果有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如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结题报告，得到了我国经济学大师尹世杰教授的高度肯定，被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推荐到《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2001年7月30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专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些学者把它放在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经济结构理论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城市化理论研究”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述评中给予高度肯定；课题研究论文一般在经济学核心期刊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有的理论成果发表以后被国家权威机构公布为当年重要经济文章“百篇”之一，很多篇理论成果或被人大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获经济研究参考和全国高等文科学报文摘，或被权威网站《人民网》《光明网》《经济日报网》《中国互联网新闻》等转载。一些高校硕士和博士（含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常在撰写此类毕业论文时把它们作为“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内容或者重要的参考文献提及，而里面许多的观点、对比研究的资料数据更是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大量引用、摘抄，使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本书选取了我的研究论文37篇，从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主题出发，我把它归类为五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变革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我对比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基础、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消费市场、通胀问题的特征与规律、论证了我国产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弊端和调整方案、对企业购并的战略、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二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我对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托达罗的两类人口转移模型进行了对比；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城市化运行特点、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阶段进行了具体的划分；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三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最突出的特色是通过攫取国有垄断企业内部分配的横断面来论证我国居民收入的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了收入分配矛盾的根本原因和解决矛盾的主要路径。四是中国人力资本不足与增长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最主要的是研究国有大型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和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整合问题。五是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发展的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侧重东部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竞争与战略定位；二元经济结构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解决方案。以上这些问题各部分之间都有极强的逻辑联系，都是影响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待解的难题，而且从内容来讲，这些不再是空洞地泛泛而谈，而力求填补空白，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目前，中国正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迈进，经济竞争已步入国际化，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三农”问题的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还步履沉重，经济转型也必然面临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难题。因此，此书的出版，仍然对地方政府完善自己的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热衷此问题的读者提供更多的观测点、找到更新视觉和更多的维度，扩大研究的选题思路；可以帮助读者快速把握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不同时期的重点和难点，找准不同时代经济跳动的脉搏；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可供对比的、有价值的重要研究资料，为撰写论文提供帮助；还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发展经济学》课程重要的教学参考读本。当然，受本人水平和资料的限制，作品难免存在遗漏和错误，还希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作者

2015年3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变革问题

中日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3
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主要特征与成因分析	9
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考	16
我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应当实现三个突破	32
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水平提升的思考	39
我国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现实选择	43
论我国企业的购并思路	50
我国第三产业滞后的原因与对策	55
论我国通货膨胀的综合性治理	60
启动我国消费市场应有新思路	63

第二部分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三个阶段	71
两类人口转移模型与我国的现实选择	77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误区及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	83
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反思	91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与农村小城镇建设	98
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102
改善我国农村经济环境必须实现三个重点突破	107
多哈回合框架协议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探析	112
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与主要对策	118

第三部分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

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假说与中国现实	125
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控	132
国有垄断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创新	139
我国贫富悬殊的特点与对策	162
国有企业负责人年薪制的思考	167
我国民工荒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169
保障我国农民工的权益要用制度安排	174

第四部分 中国人力资本的不足与增长问题

用制度安排提升我国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	185
国有垄断企业劳动者素质问题研究	191
垄断行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问题分析	206
我国国有垄断企业人力资本利用不足解析	210
国企改革的攻坚战：“用人机制”的改革	216
运用激励艺术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221

第五部分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

东亚经济 10 + 3 合作中长三角的机遇与战略选择	229
绍兴在长三角经济竞争力解析	237
绍兴在长三角经济竞争中的战略选择	249
二元经济对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影响	255
我国振兴县域经济的两个着力点	261
参考文献	267
后记	270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增长 方式的变革问题

中日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中日人口规模的比较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了粮食紧缺，资金匮乏，人均资源锐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头等问题。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人口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于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出生却长期居高不下造成的。

人口转折是指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稳定人口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稳定人口，它决定了人口增长的态势。西方学者根据欧洲发达国家的历史资料，将人口增长区分为三个阶段：（1）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阶段。人口出生不受限制，死亡则因战争、灾难、饥饿、疾病而随时发生。（2）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居高不下阶段。因医疗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死亡率大大降低，但出生率不降，结果导致人口迅速增加。（3）死亡率逐渐停止下降，而出生率开始下降。这是因为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妇女就业机会多，文化素质也提高，大多不愿过多地生小孩，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有资料表明，中国与日本在1895年左右，开始人口转变的早期扩张。根据联合国一个研究小组在1953年的调查显示，在1900~1949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在35‰~40‰，死亡率则在25‰~35‰。而日本学者冈崎推算，日本在1895~1899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6.3‰和27‰，因此两国在人口转变开始的时间上差不多。

但在人口总规模和以后出生率的下降方面，两国都相差了许多。

人口的总规模上，在清代，根据有关专家的说法，清朝户部《汇奏各省民族合数清册》记载，为3.38亿人，但不可靠，因为当时的统计制度不完善，缺登、漏登的现象很普遍。一般认为，它大大低于实际数。实际人口数，

^{*} 原载于《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000年9月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根据有关学者估计有 4 亿 ~ 4.4 亿。另一份资料显示, 1850 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口数至少达到 4.5 亿。

日本学者安川正林推算出, 1865 年的日本人口为 3450 万人, 1887 年达到 4000 万人, 此后大致每年增加 25 万人, 至 1931 年才突破 5000 万人。所以, 1895 年前后, 日本的人口总数在 4000 万 ~ 5000 万人, 或者说为 4000 多万人。因此, 从两国人口规模比较来看, 中国人口总规模比日本人口总规模多 10 倍。

不仅中国的人口规模比日本大得多, 而且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比日本慢得多, 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公司的《世界人口数据表》, 1990 ~ 1995 年中日人口转变情况, 中国: 出生率 18‰, 死亡率 7‰, 自然增长率 11‰; 日本: 出生率 10‰, 死亡率 7‰, 自然增长率 3‰。另根据有关学者研究, 如果将出生率变动水平作为二者转变时间差的根据, 那么可以看到, 中国 1970 年的出生率约相当于日本 1948 年的水平, 相差 22 年。也可以说, 中国生育率转变落后日本 22 年。这一点似乎还为后来的出生率下降所佐证。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后到 1979 年进入波动前的谷底 (17.8‰), 而日本波动前的谷底在 1957 年, 二者的出生率绝对水平相当, 而时间上恰好又相差 22 年^①。

实际上, 日本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 3‰, 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而中国现在的实际增长率仍在 10‰以上, 这仍然是较高的自然增长率, 要达到日本这样的自然增长率, 中国似乎还要一段较长时间。但是中国人口的绝对数已经太大了, 就是降到日本这样的自然增长率, 对中国目前这样资源贫乏的国家, 人口包袱也是巨大的, 1995 年 12 月 15 日《中国日报》已公布中国大陆人口达 12 亿。按联合国公布的中国人口 10‰的自然增长率计算, 中国每年仍增加 1000 多万人, 一年增加的人口数就超过一些小国。中国在这样的人口规模去发展经济, 步履当然显得十分沉重。

二、中日经济基础的比较分析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 经济基础很重要。1960 年出版的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一书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这本书, 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 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群众高额消费阶段。罗斯托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起飞”阶段, 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也是“起飞”。但一个国家

^① 朱国宏:《中日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1895 ~ 1995》, 载《世界经济文汇》1996 年第 5 期。

一旦超越了传统社会“起飞”，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了。而“起飞”的概念，是指一国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内（20~3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和生产方法的剧烈转变，而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起飞”要有一定条件，因为“起飞”就可以比作飞机摆脱地球引力和空气阻力，它需要一个“最小临界努力”，这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罗斯托提出“起飞”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积累要达到10%以上。“起飞”的第二条件是要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

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仍然只能是处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的经济相比较，经济差距约50年。

造成这样大的经济差距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工业化起步以后，享受了70多年的统一、稳定与和平，而中国社会却动荡不安，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中国当时因为人口多，工业商业经济不发展，农业极端落后，更严重的是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帝制解体、国内战争、对外战争等交织在一起，造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的破坏，国家主权与统一的破损，社会秩序的混乱，大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集中在与出口有关的原材料、矿山等部门及金融业、铁路和航运业、房地产等方面，主要发展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进行不平等交换。1913~1930年，进口价格之差扩大55%，这就是说中国要多输出50%的农产品才能换回和战前同等数量的外国工业品，中国沿海只能搞一点初级形式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到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不到5%，加上工场手工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为10%左右。而农业只能缓慢发展，其增长率不到1%^①。另外，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大量发生，战争过后是数十亿白银赔款，中国沦为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与日本共管的半殖民地。而且日本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有专家指出：这场战争使中国经济所受的直接损失当在100亿元以上，约合1936年国民收入的1/2。人员伤亡约1800万人，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共计约4000亿元以上，折合美金1800亿元（按1952年币值）。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延误20年时间。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按1957年价格计算，1914~1918年GDP为484亿元，人口为4.3亿，人均GDP为112.6元；1933年GDP为817.1亿元，人口为5亿，人均GDP为123.4元；1952年GDP为

^① 吴小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引自《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2页。

658.8 亿元,人口为 5.7 亿,人均 GDP 为 115.2 元。从 1933 ~ 1952 年,时间前进了 19 年,GDP 总值和人均 GDP 均有下降。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十分缓慢,还出现了倒退现象。有关专家指出,中国 1952 年数据只相当日本 1886 年水平。远低于日本 1930 年的水平(日本 1930 年人均 GDP 为 264 美元,按 1960 年价格)。重要的是,日本当时作为一个初步的工业化国家只有 7000 万人口,而中国却有 5 亿人口。根据一项比较研究,中国 1952 ~ 1972 年可看作是现代化的开始时间,而相似地,日本的开始现代化期却是在 1894 ~ 1914 年,二者几乎相差 60 年。有专家尖锐指出,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中国 1980 年为 7.3%,1981 ~ 1988 年为 9.9%。这样,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快于日本,前景似乎可观。只是,考虑到二者的经济基础,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可能更接近日本 1950 ~ 1973 年的情况,因为二者起跑线并不一致^①。因此,我国如果因为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较高而盲目乐观是毫无道理的。

三、中日教育、文化背景的比较分析

人口的经济社会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人口的整体素质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科技成果运用及消化的水平、效果等,而且因为人口的整体素质状况尤其是文化内涵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状况,直接表征经济的文明程度以及信用程度,是吸引资本、取得经济信任、开拓市场、占领市场的重要条件。

通过提高教育的教育贡献率,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日本非常重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早在 1962 年日本文部省发布报告指出:日本的教育普及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战后的日本教育,具有超前性和一贯性。他们不断完善教育立法,增加教育投资,使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在普及小学、初中 9 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高中和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目前日本早已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先进国家,教育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居世界第一。如日本 1960 ~ 1975 年教育投资增加了 10 亿美元,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了 3 倍多。1975 年日本人均教育费 247.7 美元/年,小学生平均教育费 1189 美元/年。而中国 1980 年人均教育费才 1.7 美元/年,小学生平均教育费 13 美元/年,1977 年和 1978 年日本的教育投资

^① 陆磊等:《日本富国之谜》,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1 ~ 202 页。

占国民经济的比率升到 6.76% 和 7.06%。其实，日本重视教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很早就普遍推进了强迫一定年龄儿童入学的义务教育制。在 1905 ~ 1960 年，日本物资的投资仅增加 6 倍，劳动力只增加 7 倍，国民收入增加 9 倍，但教育投资增加 22 倍。这样，1940 年，受完初等义务教育的劳动者已达到全部劳动人口的 1/2 以上。“二战”的失败显然使日本丧失了大量的国民财富，但一支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大军的存在成为战后复兴的中坚力量。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逊计算，1961 ~ 1971 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 1/4 源于知识进步。日本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转危为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国民具有良好的素质。

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跟日本相比相差甚远，据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排在有统计数字的 149 个国家的第 130 位。1976 年还曾排在倒数第二位，仅比也门（0.6%）高。我国 1978 年受教育人口比 1965 年增加 6.37 倍，而中学经费只增加 2.14 倍。每个中学生的人均教育费由 1953 年的 112 元降到 1965 年的 88.98 元，1977 年又下降为 39.81 元，仅相当于 1953 年的 1/3，1965 年的 1/2。1978 年，我国在校学生有 2.13 亿人，学生平均经费仅 33 元，每个小学生的平均教育费也由 1965 年的 20 元下降到 1979 年的 16 元。1987 年，我国每年约有 270 万适龄儿童失学，其中女童 224 万，占 83%。1987 年儿童退学率 95% 以下的有 11 个省区，贵州威宁县至少有 4 万儿童失学，入学率只有 66.4%，宁夏 6 ~ 11 岁的回族儿童失学率达 56.9%^①。到 1997 年还有 15 岁以上文盲半文盲 1.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3%，其中包括 15 ~ 49 岁的青壮年文盲 5300 万。1997 年，我国受初中教育人口占人口比重为 26.8%，受高中教育人口占人口比重为 9.5%，受高等教育人口占人口比重才 2.5%，这种状况的人口素质，是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 2400 余年，在政治上是一个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世袭君主官僚帝国，刻板而程式化的文官制度形成了因循守旧的文化，加上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落后保守的半封闭性宗法社会，父本位、家长制很严重，个人价值受压抑。同时，中国以儒教人文主义为中心，核心是“忠”“孝”伦理价值观，总体来说是一种崇奉传统而反对激进变革的保守温和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学习西洋技术方面，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表现出与同一时期日本人学习“西学”的根本不同的态度。日本认识到西方技

^①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8 ~ 369 页。

术的优越性以后，就建立培养翻译人才的洋学所，派遣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大量翻译“西学”书籍，1872年创建新学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生迅速增长，比中国宣布废科举、兴学校早了三十多年时间。而中国士大夫却背着沉重的传统儒学包袱去学习西洋技术。因此，日本人批评中国人“拘泥古法”。所以中国的“百日维新”只能以失败告终。而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仍然要实现“皇帝梦”。中国受封建专制、受儒家礼教统治之深，无疑是中国人的精神枷锁。有专家指出：中国“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组织上和实践中都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①，此言一矢中的。

综上所述，中国无论是在人口规模上、经济基础上，还是教育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与日本均有极大的差距，不能因近些年国民经济有较高的发展速度而盲目乐观。中国因人口规模、经济基础以及人口的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显得有些脚步沉重，经济“起飞”还要做扎实的工作，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只有有了这个思想认识，才能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①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25页。